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0.06.011

# 文学与经济初论

黄守岗

(湖北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205)

**摘要:**文学研究多从历史、文化或文学自身的艺术性等视角展开,然而在21世纪的当下,经济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认识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十分必要。文学与经济不是简单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对文学与经济关系的深入认识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也是文学研究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文学与经济;文学属性;文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0)06-0117-05

## 一、引言

文学与经济是什么关系?文学研究中少有人探讨这个问题,经济活动中也很容易忽视文学的功用,似乎发展经济素来与文学扯不上太大关系。但是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历史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发展经济需要综合考量,需要把与经济相关的文学要素考虑进去,因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提高民生福祉”<sup>[1]</sup>。从这一意义上说,繁荣文学和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同一的,简而言之都是以人的福祉为本,因为文学实质上是“人学”,正如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说:“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sup>[2]</sup>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辩证观点,文学应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文学对经济是存在反作用力的,“发展经济需要重视文学”这一说法是硬道理。《世界文学》2018年第一期刊发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的文章,文中说到:“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认知方式或载道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蕴藉了太多的集体无意识,因此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sup>[3]</sup>该文并不是一篇讨论文学与经济关系的文章,但它至少引出了新时期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学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力量渗透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社会历史阶段,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 二、经济发展影响文学发展

“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sup>[4]</sup>不过,在新时代历

收稿日期:2019-11-18

作者简介:黄守岗(1974-),男,湖北公安人,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现当代文学。

史条件下,我们绝不能因为经济的主导作用而偏颇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其他精神层面的要素,因为“现代文学和现代经济只有维持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才能维护良性的社会秩序”<sup>[4]</sup>。当然,在经济与文学的相互推动作用中,经济因素起主导性作用,经济的发展影响文学的发展。

首先,经济的发展影响文学的传播与流通。文学作品能被人们阅读和喜爱离不开文学的传播媒介与手段。没有传播的文学创作只能是自娱自乐,没有传播与流通就不能实现文学的快速发展,而传播方式与技术关乎经济因素。美国学者伊恩·瓦特在其《小说的兴起》一书中从宗教、哲学、经济、科技等诸多因素分析了小说兴起、发展、成熟的过程,发现经济因素至关重要。瓦特认为,18世纪欧洲城市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是小说读者人群增多的主要原因。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用图书馆和流通图书馆的逐步修建,据说‘腐蚀’了学童、农家子弟、出色的女佣,甚至所有的屠夫、面包师、补鞋匠和补锅匠的心灵,极大地促进了读者数量的增多。”<sup>[5]</sup>瓦特还考察了在小说兴起过程中书商所扮演的角色。书商以及出版商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处于中间人的位置,瓦特指出,由于古代宫廷和贵族阶层提供的文学庇护减弱,书商和出版商都利用彼此的优势控制和垄断报纸和杂志,在当时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实际上就控制了主要的舆论渠道。这种做法既能确保商业广告的位置,也能控制文学作品创作者,因为什么样的作品最终能被置于广大读者面前是与传播和流通紧密相关的。这样,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简单的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作家也逐渐沦为书商所雇用的工人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文学的传播以及文学的内在形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虽然是文学的精神表现,但是书商和出版商的利益动机是这一变化的主导因素。因此,经济因素在文学传播中起着主导作用,经济生活主导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又反作用于经济生活。因为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自古以来是刊刻、印刷和出版等,没有刊刻印制就不可能广泛传播,毕竟通过手抄本保存并流传下来的数量极为有限。即使在21世纪数字媒体成为传播主流的当下,互联网也不是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印刷、出版仍是文学作品传播的主流,而书籍的刊刻、印刷与出版其实质主要是一种商业活动,受商业活动规律的支配。而支撑商业活动的主要是供求关系,“供”关乎利润,“求”则关乎消费者的需求与兴趣。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正是读者的好奇心和审美兴趣的引导,决定了书商、出版商和作者的产出活动。中国古代小说善于讲述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尤其善于描写外部细节,情节曲折,场景生动,这正是出于抓住读者好奇心与兴趣的考量。例如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除了情节上的起伏多变外,还有大量有关建筑与服装的细节描写,仅此一点就足够吸引读者的兴趣,尤其是吸引那些对明清文化感兴趣的读者的兴趣。

其次,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学文体的变化。就文学体裁而言,最早的文学样式为诗歌,中西文学皆是如此。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西方的《荷马史诗》也是在民间流传的短歌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叙事长诗。诗歌之后世界文学史上陆续出现了戏剧、散文、小说等不同体裁。虽然小说的兴起在世界各国的时间都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小说这一体裁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生活方式及需求的演化而兴起的。仅从中国文学史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活跃着不同的文学文体,人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指的这种现象,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正是对这种文学文体更替现象的描述。世界文学史上亦如此。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文体的更替呢?这除了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引起了反映人的生活艺术形式的变化。若文学墨守成规,毫无变化,那就不是人们喜不喜欢文学,而是人们需不需要文学了。因此,随着经济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文学的变化也就显得十分必然与合理了。五四时期出现的白话文学以及当下出现的网络文学都是经济影响文学最显著的例证。随着世界经济力量的不断向前发展,科技革命推陈出新,当今时代已不再是依靠印刷出版为唯一传播方式的年代,而是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自然而然会兴起。反过来说,互联网时代不用网络的方式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不体现网络时代人的风貌和生活境遇,不反映网络带来的深刻变化,那就是与时代脱节,这样的文学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草,注定没有生存

的环境。因此,新时代历史条件下的文学不仅以网络技术为传播手段,也应该以互联网时代的人的生活为题材。实际上,新的时代已催生出很多新的文学体裁,例如夫拉夫诗(Flarf Poetry)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顺应而生的一种新的诗歌门类<sup>①</sup>。

其三,经济通过影响人性从而影响文学内容。很多人提起文学联想到的是“小说”“虚构”“语言文字的艺术”等字眼,但按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文学和历史其实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因为本质上两者都是某种“叙事”或“书写”,都是对人的活动的记述和反映。因此文学当然不只是“语言文字学”,其实质是“人学”,其核心内容就是“人”,人性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但人性并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既包含“人的一般本性”,也包含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意识形态中的人的具体本性,比如儒家强调人性本善,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人而已。因此,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对人性的理解是随着历史的变动而变化的,而推动历史变动的,首先是经济因素。例如,我们经常讲当今社会世风日下,许多人肤浅浮躁、缺乏诚信、不择手段,这些难道是人的固有属性吗?与时代的变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关系吗?我们之所以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还存在许多负面问题,其中有很多不是法律、道德能解决的,而是取决于如何尽量激发人性中的真善美。相应地,作为反映人的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与文学作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电视电影等艺术创作作品,内容上必然也要涉及上述问题,因为只有体现时代性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才会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欢迎。

### 三、文学具有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属性

文学是精神产品,这既是共识,也是常识。但文学仅仅是精神产品吗?或文学只具有精神属性吗?它有无经济属性?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关注,似乎谈经济属性就降低了文学的地位乃至降低了文人的品格,这或许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传统价值观有关。实际上,无论从文学创作的内容还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经济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精神对于文学的创作具有主导作用,而经济对于文人的生活和文学的创作,对于文学文体的产生与兴盛,对于文学的印刷、出版、传播媒介的变动同样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最早提出文学具有经济属性的应该是华东师大教授陈大康,他于2004年11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小说风格与改写》,提到在明代小说研究中发现的一系列背离传统文学观念的奇怪现象:《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问世近200年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才兴起;《西游记》与魔幻小说也相隔半个世纪;短篇小说的兴盛出现在明末清初,距离清代有一百多年的空白期;通俗小说出现于元末明初,随后有约200年的空白期,明末清初繁荣以后又出现很长一段空白期,而且大多集中在晚清30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陈大康归因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包括传播动机、传播内容、传播手段等,而这些与传播有关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商控制的。“书商长期以来一直在出版领域占据主导地位。”<sup>②</sup>陈大康据此提出小说这一体裁具有精神和商品双重属性。事实上,除了小说,戏剧和诗歌也都具有经济与精神双重属性。例如,威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就有商业与贸易方面的主题。“《威尼斯商人》也可以被看作是国际私人贸易的故事,该剧讲的是一个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故事”,它既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显失公平合同或者附高额赔偿金或附惩罚条款的合同纠纷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跨文化交易陷阱的案例研究”的故事<sup>③</sup>。因此,文学并不是仅囿于精神世界的高阁之物,它有着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属性。

首先,从文学创作的条件来看,文学的创作肯定是需要条件的,若将其视为精神产品,似乎只需精神条件,无需经济条件,然而,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直接表明,诗歌的内容直接来源于“饥饿”和“劳动”等与经济相关的要素。这些诗或歌不是专门从事创作的人来完成的,而是在劳作之余的田间地头创作出来的。由此可见,文学创作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有闲”。谁才能具备“有闲”

这个条件呢?当然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如果一个人饿得头晕目眩,写一个字都困难,他怎么能够构思选材,怎么进行创作呢?有食方有闲,有闲方有文,这表明文学创作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古希腊时代的伟大史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经典大多出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富人之手。例如,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和哲学家,出生于伦敦一个新的贵族家庭;杰弗雷·乔叟是一位富有的酿酒师的儿子;威廉·莎士比亚出生在一个富庶的杂货店商人家庭。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之作也大都是那些有一定经济或政治地位的士大夫所作。

其二,从文学创作的动机来看,创作动机的产生——情感的冲动似乎是纯精神的,特别是流传千古的名作往往是“不平则鸣”的“发愤”之作,而“愤愤不平”从表面看来是精神层面的,但不平和愤怒的缘由很大程度上不外乎是人生命运的多舛、仕途上的不顺或遭受冤屈而不能昭雪等因素。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政治地位与经济条件往往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即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发迹往往会带来经济上的富庶。《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举前的范进家徒四壁,中举后生活条件却马上有了极速提升,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甚至使得范进的母亲难以接受和适应,以至于过度兴奋而一命呜呼,实在是荒唐至极,然这却显示了政治地位与经济条件的相辅关系。相应地,一旦仕途受阻、官场受挫则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引起人情感上的巨大失落,而这种人生遭际往往是文学创作最直接的动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红楼梦》就是由官场失意、家道中落的曹雪芹奋笔疾书的不朽经典。再比如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中最深入人心情节往往都可以找到作者内心中隐藏的对某种东西不曾拥有而渴望拥有的抱憾心理。“缺官位的写做官,缺功名的写功名成就,缺钱财的写经商致富,缺情爱的写郎才女貌,花前月下……写来写去,终不脱生理的需求、心理的欲望,总不出‘功名富贵’四字,最终拂不去、掰不开‘财色食货’四大样。”<sup>[8]</sup>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文学创作与经济地位的状况和变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因素的变动引起人情感层面的巨大起伏,这种起伏往往要靠某种途径加以宣泄,文学创作或许就是一种健康而安全的宣泄方式。

其三,对文学的传播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利益。文学的传播与文学内在形式及审美趣味的变化虽然是精神性的表现,但主导这种变化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播者——出版商与书商的利益考量。此所谓经济性主导精神性。人们喜不喜爱文学,喜爱读什么样的文学,愿不愿意花钱阅读文学与一个时代的风尚有关,同时也与读者手中能拿到什么样的阅读作品有关。一部作品能不能出现在大众面前除了其自身质量外,还与出版商们对书籍买卖的利润估算有关,一部具有引领精神的作品,即使艺术与社会价值再高,由于曲高和寡,商业利润不大,出版商们也不愿意加以宣传和传播,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治性或具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往往需要政府资助或牵头来推动流通,文学传播的主流还是一种商业运作。

除上述层面外,文学与经济活动本就有着天然的联系。经济 and 文学虽然看上去一方是枯燥的数字,另一方是鲜活的语言,但二者都站在良知的基础上,使用语言的工具,汲取生活的源泉,其实有着深刻的自然关联。文学温暖心灵,文学激发良知。生动的文学语言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载体。经济工作者既应成为“记账员”,也应成为“笔杆子”。很多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家都是口才好笔头好的文人,不然他们的经济思想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并加以广泛应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sup>[9]</sup>对于一个细心、善于观察与思考的经济工作者来说,每一部经济学典籍都是一个充满文学形象的丰富矿藏,如果坚持运用文学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深入观察经济工作,思考和表达经济生活,则能既有利于自身能力的提高,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如果说文学是情感的语言艺术表现,而情感则是人的欲求在现实中实现状态的生理、心理反映,那么文学不过是人的欲求状态的艺术表现。而人的欲求的最基本层次是生理的欲求,生理欲求不外乎“财色食货”等,其属性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因此经济生活是文学自身的因素而非文学的外在之物。如果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那么经济生活则是人生活的主要方面,也是文学所反映的主要内容,自然应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经济视角研究文学,既是对学术研究领域的积极开拓,又能使读者的思想境界得到滋养和提高。经济活动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项基本活动,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基础和条件,人离不开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是人的生活的基座和底线。而文学是人学,它离不开人生活的全部,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文学与经济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有着天然的联系。

#### 四、结语

我们今天讨论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既是更好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扭转文学在当下日渐式微的需要。不得不承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环境下,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人文学科被边缘化。然而,一个缺乏艺术品味的人容易变成一个单调乏味的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发展经济、繁荣文化需要齐头并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习总书记早在2016年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sup>[10]</sup>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探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在经济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当今社会,探讨文学与经济的关系不仅具备理论层面的价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发展经济,把经济发展的目的落实到增进人民福祉上,同时也是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文学研究不应该只是精神层面的研究,只有重视文学研究的经济视角,文学研究才能还其本原,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也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

#### 注 释:

- ① 夫拉夫诗(Flarf Poetry)是21世纪初诞生的一类先锋派诗歌。“Flarf”这个词来自美国诗人Gary Sullivan,他也是最先创作出版夫拉夫诗的诗人。夫拉夫诗歌创作所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用随意出现的语词搜索互联网,然后将搜索结果提炼成滑稽可笑的诗歌文本。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2.html>,2017-10-28.
- [2]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J].文艺月报,1957,(5):26-28.
- [3] 陈众议.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J].世界文学,2018,(1):212-232.
- [4] 任杰.现代文学与现代经济的关系研究[J].智库时代,2019,(6):26-29.
- [5]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58.
- [6] 陈大康.小说风格与改写[N].解放日报,2004-11-07.
- [7] 安尼塔·艾伦,迈克尔·赛德.国际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莎剧《威尼斯商人》中的跨文化贸易[J].武汉大学国际法评论,2005,(5):212-228.
- [8] 许建平,祁志祥.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36.
- [9] 刘兰英,等.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四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134.
- [10]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130/c64094-28915395.html>,2016-11-30.

(责任编辑:颜 莉)